

評 Marcia R. Ristaino, *The Jacquinot Safe Zone: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*

Marcia R. Ristaino, *The Jacquinot Safe Zone: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*.
Stanford, Calif. 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8. xiii, 206pp.*

許秀孟**

—

這是一本關於法國耶穌會神父饒家駒 (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, 1878-1946) 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從事人道主義服務的研究。本書雖然圍繞在饒家駒個人的活動事蹟上, 但作者有幾點核心關懷, 一是戰爭中的平民如何得到保護; 二是饒家駒如何實現人道救濟的精神; 三是饒家駒安全區的歷史背景與國際性的意義。

近年來, 有關中國戰時的難民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; 不過以往多以社會學的視角探討難民的產生、流向遷移、數量結構、群體組成、政府政策、慈善機構、同鄉會、華僑團體的救濟等議題,¹ 針對外國救濟事業的研究則集中於中國紅十

* 本書於2011年出版中譯本: 阮瑪霞 (Marcia R. Ristaino) 著, 白華山譯, 《饒家駒安全區: 戰時上海的難民》(南京: 江蘇人民出版社, 2011年)。為忠於原著, 本文引用之頁碼為英文原著之頁碼。

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, 特此致謝。

收稿日期: 2012年12月25日; 通過刊登日期: 2013年3月1日。

*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

字會與華洋義賑會等組織。² 而本書的特色則是描繪一個行動鮮明的法國傳教士，從其與中國當局，及日本、美國、法國等駐中國領事的書信、電報往返中，爬梳曾在中國存在一段時日的安全區的歷史，也從中挖掘與人道救濟互相糾結的政治、外交力量，甚具開創性。

安全區的概念在日後被寫入1949（民國38）年國際議定的「日內瓦公約」第四公約中，「饒家駒安全區」此一名稱則被援引作為實際的參考範例。「日內瓦公約」所代表的精神是國際人道法的落實，是關於戰爭受難者、戰俘和戰時平民所應得到的待遇和保護。³ 但是，關於安全區出現的背景與歷史脈絡，卻莫衷一是，饒家駒的生平和事業更鮮為人知。作者阮瑪霞（Marcia R. Ristaino）為了尋找答案，先後輾轉於美國、中國、法國、日本、瑞士等地蒐集資料，查閱各國檔案與文獻，終於拼湊出饒家駒被人遺忘的歷史身影，而於2008年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，並於2011年出版中譯本，以饗華文讀者。

¹ 相關專著包括孫艷魁，《苦難的人流——抗戰時期的難民》（南寧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）；張根福，《抗戰時期浙江省人口遷移與社會影響》（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1年）；蔡勤禹，《國家、社會與弱勢群體：民國時期的社會救濟（1927-1949）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）；Stephen R. Mackinnon, *Wuhan, 1938: War, Refugees,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8)；王春英，《中國抗戰時期難民問題與政府應對行為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；高鵬程，《紅卍會及其社會救助事業研究（1922-1949）》（合肥：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等。另參考谷秀青、彭雷霆，〈近年來關於抗戰時期難民研究的綜述〉，《江漢大學學報（人文科學版）》，2006年第1期。

² 如黃文德，《非政府組織與國際合作在中國：華洋義賑會之研究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，2004年）；蔡勤禹，《民間組織與災荒救治：民國華洋義賑會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）；池子華，《紅十字與近代中國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）；張建傑，《中國紅十字會初期發展之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；戴斌武，《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研究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等。

³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國際社會擬將戰爭違法化，特別於「聯合國憲章」中規定禁止行使武力的原則。其後國際法把重點放在保護戰爭犧牲者，而發展出國際人道法的範疇。1946年，各國紅十字會進行會議，認為有必要訂定戰時保護傷病者、俘虜和平民的新條約。1948年，國際紅十字會在斯德哥爾摩會議上完成草案，於1949年8月12日的日內瓦外交會議中，通過4項「日內瓦公約」，統稱「戰爭犧牲者保護公約」。日內瓦第一公約為戰地傷病兵保護條約、第二公約為海上傷病及船難者保護公約、第三公約為俘虜待遇公約、第四公約為平民保護公約。參考陳隆志主編，《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》（臺北：前衛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372。

阮瑪霞現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翰·克魯格中心（John W. Kluge Center）研究員、美中政策基金會（The U.S.-China Policy Foundation）顧問，長期關注中國事務。阮瑪霞與中國的機緣，來自其父親在上個世紀曾在上海生活過，因此民國時期的上海成為阮瑪霞主要的研究課題，先後出版了 *China's Art of Revolution: The Mobilization of Discontent, 1927 and 1928*（中國革命的藝術：1937-28年間不滿情緒的煽動）、*Port of Last Resort: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*（最後的容身之港：上海的僑民社團）等書。在利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檔案，以及研究二戰期間到上海避難的猶太難民過程中，阮瑪霞多次發現饒家駒神父的名字，但其人其事卻語焉不詳。饒家駒從何而來，所為何事，作者翻諸史冊，遍尋不著，因而著手研究饒家駒的生平經歷，而有本書的成果。

全書共分 8 章，分別為〈早年歲月〉、〈來到中國〉、〈痛苦之中的上海〉、〈饒家駒安全區〉、〈仿效饒家駒安全區〉、〈海外籌款〉、〈饒家駒安全區內的生活〉、〈最後的日子和遺產〉等。在史料方面，作者廣泛蒐集各國的檔案文件，如法國外交部檔案館中的駐中國上海、北京領事館歸國檔案、上海市檔案館中的公共租界工部局、法租界公董局年報、議事錄、日本外務省檔案、美國國家檔案等。此外，並前往上海市圖書館、瑞士聯合國總部圖書館、日本國會圖書館、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地蒐集相關資料，足見史料運用的豐富程度。

二

第一章〈早年歲月〉，作者析論饒家駒的成長背景與信仰鍛鑄的過程，指出耶穌會的神父必須經過十多年的訓練，不僅要培育自律和虔誠的人格，更須具備語言技能，以及歷史、哲學、科學等方面的知識，使他們於教學、宣教中能與所服務的國家與地區打成一片。因此饒家駒在語言能力與文化知識方面都經過長期的磨練，發揮在傳教事業上。第二章〈來到中國〉與第三章〈痛苦之中的上海〉，分別描述饒家駒來到中國的機緣，以及饒家駒應對上海的災難。由於法國耶穌會在 19、20 世紀之交牽扯到國內的政治鬥爭，而遭受排擠與驅逐，多數的神父被遣送他國，饒家駒在此風潮中於 1913 年被派往中國從事傳教工作。

初到上海的饒家駒，先學習了中文，後成為上海虹口教區的神父，為中國基督徒，也為葡萄牙基督徒服務。在日漸增長的聲望中，他先後被任命為上海公濟醫院的院長、祈禱福傳會（Apostolate of Prayer）的會長，並在耶穌會開辦的震旦大學教授英語與自然科學。然在一次實驗發生意外爆炸時，炸掉半截右臂，此後得到「獨臂神父」的稱號。除宣教、教學之外，國民黨北伐期間，饒家駒曾勇敢地營救遭受暴力威脅的修女團及孤兒群，送入公共租界尋求保護，展現優異的組織能力與過人的勇氣。1931年華北大水災沖毀數以萬計中國人的家，饒家駒也加入國民政府成立的救濟水災委員會，負責賑災物品與救濟金的發放、分配工作，並監督地方救濟組織的運作。在救濟事業中，饒家駒建立了與中國政府官員和地方菁英領袖（宋子文、虞洽卿等）的人脈網絡。

頻繁的救濟行動，使饒家駒累積出豐富的危機處理能力，最關鍵的是他善於與不同團體、國家談判。1932年1月日本砲轟上海，閘北燒成一片，饒家駒為營救陷於火海中的難民，會見了中、日交戰雙方，說明其奔走的目的，終取得停火4小時的協定。短暫的停火，卻足以拯救2,000多名驚惶失措的難民，其中大多數是婦孺。然中、日關係持續緊繃，導向兩國全面開戰的局面已箭在弦上。第四章〈饒家駒安全區〉，重建饒家駒成立安全區的過程。1937年8月，國民政府調集數量龐大的軍隊，決與日本在上海進行生死戰，日本陸、海軍也持續增援中。風聲鶴唳的情勢讓饒家駒預見一場無可避免的轟炸災難，他隨即以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，兼其下轄的難民委員會主席的身分，連繫上海各國代表，籌組「南市監督委員會」，以利於與中、日雙方談判。饒家駒前後面見了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、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正與上海市市長俞鴻鈞，倡議在南市劃出一片安全區，作為難民的避難所，任何軍事行為皆不得存在該區。饒家駒向日本保證此區不會有中國軍隊。同時，為消除中國政府對喪失主權的疑慮，則允諾在上海國際組織的監督下，由中國警察負責維持治安。

在不違背戰爭國間的戰略，同時能減少非戰鬥人員傷亡的最大共識下，達成了中、日雙方對安全區的承認，作者認為饒家駒展現了精明的談判手腕。南市安全區於1937年11月9日正式開放，以發放通行證作為進出入的控制。安全區設置的目的之一是阻止空襲轟炸造成大範圍的破壞，以保護戰爭狀態下的平民。但理想與實際終究有落差，日軍很快以砲彈占領南市，並恣意進入安全區搜捕中國戰

鬥人員。饒家駒面對無法控制的暴力行徑，最終讓日本軍隊進入安全區維持秩序，使安全區得以繼續存在。儘管必須以諸多妥協為代價來維持上海的安全區，饒家駒仍致力在中國各城市推動安全區的概念。

第五章〈仿效饒家駒安全區〉，說明中國其他城市設置安全區的情形。隨戰爭情勢的發展，南京、漢口、廣州、福州陸續有設置安全區的提議，但因各城市有不同的戰略地位，成立安全區並非一帆風順。漢口在饒家駒奔走下，艱辛地取得各國協議。在南京，由約翰·拉貝（John Rabe，1882-1950）為主席的南京國際委員會向日本當局談判劃定安全區範圍時，立即遭到拒絕。日方認為南京是其軍事計畫的中心，並且尚有中國構建的防衛工事，如此安全區將成為其進攻的障礙。隨後南京更發生了毫無人道的大屠殺。漳州、深圳、香港、廣州、福州等地，也陸續傳出設置安全區的倡議，雖規模大小不一，但多仿效饒家駒安全區的模式。依據作者的估計，各地的安全區至少保護、救助了50萬名中國難民。

走筆至此，作者已大致描繪出饒家駒安全區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意義，為了更完整呈現安全區的運作，第六章〈海外籌款〉、第七章〈饒家駒安全區內的生活〉，分別討論饒家駒於1938年5-8月間至海外籌款以支撐救濟事業的經過，以及安全區內難民照顧、管理等實際層面。饒家駒的海外之行得到上海國際紅十字會的資助，並有中國政府高層蔣中正、孔祥熙、宋子文等人的表態支持。其先後至美國、日本展開募捐活動，且會見了美國總統羅斯福（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）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，在宣傳人道救濟的同時，也染上政治的色彩。安全區內的生活，作者僅以短小的篇幅，略加描述關於遣返難民、分發食物衣服、教育醫療、清潔衛生以及紀律規範等，難民個別的災難經歷則隱而不顯。第八章〈最後的日子和遺產〉，講述饒家駒安全區的意義。1940年後上海的戰局漸趨穩定，安全區於6月開始不再收留、救助難民，饒家駒亦被巴黎的耶穌會召回法國服務，其在中國的事蹟暫告一段落。往後饒家駒持續於國際推廣安全區的理念，最終得被引入1949年「日內瓦公約」中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範例之一。

三

本書突顯戰爭時期的人道危機與轉機問題。饒家駒作為一名外國神父，除其人道信念之外，更須要對中國的政治、社會文化有深厚的了解與體悟，方能處理交戰國間語言障礙、利益衝突及非理性暴力等諸種危機。作者指出饒家駒所具有的這些特質與能力，讓他能在中、日交戰雙方間爭得緩衝，而成功於上海南市設置了不受轟炸的安全區，保護並救濟多達30萬的難民。由於上海安全區成功的示範，其概念被仿效到南京、漢口等城市。雖對數百萬逃難的中國人來說，安全區能接濟的人數如杯水車薪般的微薄，但其蘊含保護戰爭受難者的普世人道價值，爾後能被提到國際人道法的崇高地位，說明了饒家駒救濟行動的正當性與正義性。基於此，作者對饒家駒做了完整而成功的書寫，還原一段被忽略的歷史，這是本書的貢獻之一。其次，藉由描繪一位法國傳教士在中國的人道救助，作者點出中國抗戰帶有的世界性問題，即如何保護戰爭狀態下無辜的平民。設置安全區是一個確實存在過的歷史經驗，對於現今思考難民問題仍具有啟發意義。其三，作者在梳理饒家駒於中、日交戰國間的折衝過程時，帶出雙方面對難民的複雜態度，這是以往較少被注意到的議題，筆者想藉此試著提出來討論。

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本當局如何討論、處置中國的難民，一直是被暴力渲染或刻意忽略的議題。從本書的敘述中，可以看到日本對安全區的設置，其考量的是要避免其成為藏匿、發展抗日勢力的溫床。不過作者認為日本當局在防範的心態下，仍需有人能幫助他們有效地處理大量流離失所的平民。（頁80）1937年11月5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正在給饒家駒的信中，就承認了上海安全區存在的意義：「一個專門為平民設立的地區，完全杜絕任何軍事行動或武裝的敵對行為。」（頁65）同月，日本駐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也援助資金給上海的國際難民委員會，作為對饒家駒維持安全區的肯定。（頁76）但是一旦涉及戰略利益，例如首都南京，日本就反對設置安全區，並在占領南京後，宣布所有難民和救濟事務，包括向難民提供食物這一主要職責，都由日本成立的「自治政府委員會」負責。（頁91）在摒除外國勢力的保護下，日本接掌所有難民事務，卻也傳出大屠殺的事件。

國民政府對難民問題同樣有複雜的考量。1938年後，大量的難民跟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，中、日戰場也逐步轉向華中，饒家駒為設置漢口安全區，和宋美齡有過一番談判。宋美齡為保衛武漢，堅持必須持續疏散平民，以利戰術準備，並且質疑安全區有為日本作嫁之意。饒家駒則極力解釋，無法疏散而被留下的難民，仍須得到照顧。最終雙方還是取得成立安全區的協議。（頁96-97）國民政府日後從武漢撤退，臨走前還破壞了鐵路、火車站、電話，以及可能被日軍使用的公共設施，導致留下的難民遭遇生活的困難。（頁100）此中，正義的孰是孰非，須待檢證，不過至今仍甚少研究關注到中、日兩國在處理中國難民上的諸般思考與矛盾行為。

在肯定本書的貢獻之餘，筆者有幾點想法欲提出來和作者，以及讀者們商榷。

一是在中國救濟事業中，應如何定位饒家駒的人道救濟與安全區的設置。⁴ 民國以後，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，都逐漸將救濟事業視為公共事業，上海的慈善團體更是多不勝數。當戰爭爆發時，面對蜂擁的難民潮，最先動員起來的往往是這些團體機關。學者羅義俊研究整理指出，抗戰爆發後，上海有4大救濟系統，分別是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（簡稱慈聯會）、市救濟委員會、國際救濟組織（包括紅十字會、世界紅卍會、基督教救濟會、華洋義賑會等）、同鄉會系統（如寧波同鄉會、廣東同鄉會）。⁵ 這些救濟系統之間又互相支援，彼此關係緊密。作者雖交代了饒家駒為1937年10月成立的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，卻沒有釐清饒家駒與紅十字會的關係，以及紅十字會在上海社會的資源網絡。以饒家駒的個人力量，要進行龐大的救濟計畫，非得要有政府、社會與國際組織在人力、財力上的支助不可。本書顯然過於注重饒家駒個人的談判能力，卻忽略支撐其事業背後的社會基礎與政治資源。因此，在閱讀本書時，很難將其聯結到中國的難民救濟脈絡中，作者相對也缺少和目前的研究成果的對話。

二是中、日文檔案、史料運用偏少，特別是中文資料明顯不足。筆者非常敬

⁴ Stephen R. Mackinnon在評論本書時也提到這個問題，筆者在他的基礎上，把此問題說明的更完整些。見Stephen R. Mackinnon, "The Jacquinet Safe Zone: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 By Marcia R. Ristaino", 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, 2009, Vol.68(1), pp. 278-280.

⁵ 見羅義俊，〈八一三時期上海的難民工作〉，《社會科學》，第8期（1982年）。

佩作者為中國難民研究展示了重要的西文外交檔案、耶穌會檔案、報刊等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料，但仍須指出本書的中文資料運用的非常少，這可能使本書在一些情節上探討不足。例如作者對交戰國政府，以及租界區各國領事們對安全區的態度，著墨過少。討論安全區問題若抽離各國間對己身利益的計算、比較，就難以衡量饒家駒救濟行動的意義，而這可從中、日的政府檔案中進行更深層的挖掘。上海爆發戰爭後，英國駐滬代理總領事曾向中、日雙方提出設立「中立區」，希望中、日兩軍共同退出中立地帶。此議受到日方極力反對，中國也因主權受損而不願接受。⁶ 爾後饒家駒倡議保護平民的安全區，雖力主不危及中國主權，中國並得以派駐員警維持治安，然卻與於中國既定的戰略有所衝突。淞滬會戰期間，中方下達死守南市，⁷ 日後日軍占領南市，懷夾報復心態，以搜捕躲匿的中方戰鬥人員為藉口進入安全區，恣意而為，製造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。饒家駒無法控制安全區的安全，還是必須歸結到中、日雙方對安全區的態度，是暫時遷就，還是信念支持，才能避免過度書寫饒家駒的影響力。

三是關於安全區內難民的生活。此方面的討論是本書較為單薄的部分，但卻是相當重要的議題。安全區內除安頓難民住所、衣食之外，尚有醫療服務、公共清潔衛生、維護秩序與教育照顧等問題。這些多由天主教組織和各慈善機構共同承擔，包括消毒、清潔住所與街道，給予疫苗接種、西藥施治與營養補給，以及管理生活秩序和調節糾紛等，直接間接帶入現代衛生醫療體系與公共管理的生活模式。學者孫艷魁即指出此種國際性的難民救濟機構，相比於政府、傳統慈善團體與同鄉會系統等的收容所，其難民生活的物質條件是相對較好的。⁸ 因此或可追問國際的人道救濟在醫療、衛生、照顧體系上是否影響中國傳統的救濟組織。此外，筆者認為尚須注意難民個體的逃難經歷與回鄉、遣送問題。難民是否感受

⁶ 見羅義俊，〈上海南市難民區述略〉，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》，第2期（1990年）。另外在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中也可見到相關的電文，見「俞鴻鈞電蔣中正」（1937年8月3日），〈對美關係（二）〉，《蔣中正總統文物》，國史館藏，典藏號：002-090103-00003-118。

⁷ 相關檔案可見「俞鴻鈞電蔣中正」（1937年9月12日），〈對美關係（二）〉，典藏號：002-090103-00003-128；「俞鴻鈞電蔣中正」（1937年11月8日），〈對英法德義關係（四）〉，《蔣中正總統文物》，國史館藏，典藏號：002-090103-00014-102；「顧祝同電蔣中正」（1937年11月12日），〈對英法德義關係（四）〉，典藏號：002-090103-00014-101。

⁸ 孫艷魁，《苦難的人流——抗戰時期的難民》，頁114。

到安全區的保護，這或許才能真正突顯饒家駒安全區的價值所在。近年來出版了幾部以難民為主體書寫的專著，皆重視難民的災難生活與生存策略。⁹ 抗戰期間無以計數的流離人口，每一個個體生命都烙下不同的戰爭印記，唯有對個案細密地爬梳與觀察，方能貼近當下的災難經驗與感受。而人民苦難史，即如何面對恐懼、應付創傷，正是民國史亟待開拓的議題。¹⁰

總結上述，作者運用了多國檔案資料，拼湊出饒家駒及其安全區的來龍去脈，並且以極具敘述筆法的文字呈現，讓本書兼具史料與傳記的特色。筆者認為本書為中國難民的研究打開一扇窗，除補白了中國設置安全區的歷史外，也揭示中、日兩國面對難民問題的複雜思考。作者由一個強烈的人道關懷出發，突顯其中糾結的政治、軍事問題，這是本書很成功的地方。也藉此書的優點，回顧、省思目前的難民研究成果中，較為缺乏的部分。筆者認為以往的研究多停留在對檔案資料的描述，尚未累積成一有系統性的問題意識，導致難民研究龐雜紛陳，難以聚焦。討論難民救濟者，多著墨政策面；討論難民問題性質者，橫以社會學理論概說。但必須思考的是，政策的對象是人，在難民身上是否投射出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在其間的作用，以及個體如何應對苦難的生命經驗，筆者認為這樣的討論仍須更多努力。最後，再論本書的價值，雖然其多以外文史料為基礎，而缺乏中文檔案史料，並有部分議題申論不足，但仍不掩其開創性的貢獻，因此值得有志難民研究者參酌之。

⁹ 如 Diana Lary, *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: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, 1937-1945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0); R. Keith Schoppa, *In a Sea of Bitterness: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-Japanese War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.

¹⁰ 汪榮祖，〈民國史研究若干議題的探討〉，「近代國家的型塑：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臺北：國史館、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，2012年9月13-14日。

